

傅为翘与吴石将军的家国情缘

□邓贤龙 朱振山 文 傅德隆 摄

谱序为证——翰墨寄深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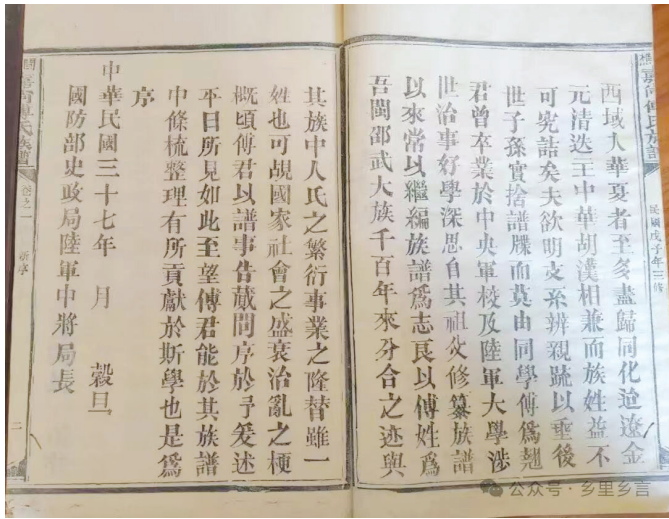


连日来,随着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热播,一批批记者、文史专家及历史爱好者先后来到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反复询问求证,聚焦一位从闽北走出的传奇人物——傅为翘。他是吴石将军生死与共的战友,更是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真实存在的邵武骄子。一部族谱、一篇序言、一场护宝行动,随着探访的深入,傅为翘与吴石将军的家国情缘,清晰浮出历史水面。

傅为翘,字少鹏,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)生于邵武拿口镇加尚村,自幼浸润在傅氏家族“好学深思”“涉世治事”的家风中,从私塾到军校,一步一个脚印,先考入黄埔军校六期交通科,后又进入当时的陆军大学深造。而傅为翘的挚友吴石,清光绪二十年(1894)生于福州闽侯县螺洲镇,长傅为翘十四岁。二人虽年龄有差,却在军校同窗共读的岁月里结为莫逆之交。一位是沉稳干练的邵武后生,一位是学贯中西的闽都儒将,两人志趣相投,惺惺相惜,这份情谊在日后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愈发醇厚。要理解傅为翘的成长,不能不追溯加尚村傅氏的家族渊源。数百年来,加尚傅氏族人或寒窗苦读求取

功名,或投笔从戎报效国家,人才辈出,蔚为大观。时光回溯至民国三十七年(1948),在邵武,傅氏正筹备第三次纂修族谱。这对当地而言,是一件轰动乡里的盛事。作为傅氏族人重要成员的傅为翘,想到一向敬重的挚友——时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吴石将军。当傅为翘向吴石求序时,这位身居要职、日理万机的将军并未因公务繁忙而婉拒。相反,他慨然应允,研墨铺纸,挥笔写下了一篇近四百字的《傅氏族谱序》。在这篇序言中,吴石开篇即纵论三代以降宗法谱牒之流变,笔力雄健,史识渊博。他亲切地称傅为翘为“同学傅为翘君”,盛赞其“涉世治事,好学深思”。这八个字,既是对傅为翘人品的精准概括,又对加尚傅氏数百年家风给予凝练表达。正是这种“好学深

思”的文脉传承与“涉世治事”的经世精神,滋养了傅为翘,使他从小尚村的山间小路走向广阔天地,成为吴石信赖的左膀右臂。序末,吴石落款“国防部史政局陆军中局局长古闽吴石”,字迹端严,气韵沉雄。这一纸序言,见证了傅为翘与吴石超越一般同僚的深厚情谊,更成为加尚村傅氏族谱中最珍贵的一页墨宝。“我们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本族谱的分量。”傅氏二十三代裔孙、加尚村村委副主任傅德隆小心翼翼地捧着民国三十七年三修的《闽樵嘉尚傅氏族谱》,激动地说:“吴石将军的序是受为翘公所托,他称为翘公为‘同学’,这份感情太珍贵了。我们全族人都感到无比自豪,原来我们加尚村的傅家与这样的大英雄有这么深的渊源!”在村里德高望重、当了二十余年老支书的唐春荣也回忆道:“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讲,村里傅家修谱,请了外面的大官写序,后来才知道,求序的就是我们村的为翘公,写序的竟是电视上热播的吴石将军。”



吴石作的《傅氏族谱序》



邵武市拿口镇加尚村航拍图

生死相托——星夜护国宝



如果说谱序见证了傅为翘与吴石的深情厚谊与家风传承,那么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的“末次情报资料”转移行动,则将二人的关系升华至生死相托的至高境界,成为检验“涉世治事”这一家风的试金石。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,正是《沉默的荣耀》所聚焦的隐蔽战线斗争的真实背景之一。

所谓“末次情报资料”,系20世纪初日本在华情报机构负责人末次政太郎所主持辑录的剪报资料。末次政太郎在北京成立“末次研究所”,组织人员系统搜集、翻译、剪贴中外报刊,时间跨度自1913年至1940年,历时近三十年,共得755辑、15.1万篇,约2.2亿字。内容以“中国问题”为中心,“中日关系”“中日战争”为主线,涵盖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外交、社会等各个方面,是记录日本侵华罪证、研究中国近代国情不可复制的海量珍贵档案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这批资料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接收。1949年,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前夕,严令将包括“末次情报资料”在内的500余箱机密档案从福州运往台湾。时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将军深知,这批档案若运往台湾,将成为蒋介石“反攻大陆”的情报工具;若能留在大陆,则既可为解放东南沿海提供情报支持,又将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学术资源。他下定决心,不惜一切代价,也要将这批国宝留在大陆。

一场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的生死守护战就此打响。而在这场行动中,吴石最信任的执行人、承担最

关键环节的,正是时任绥靖公署第四处少将处长的傅为翘。第四处掌管交通、通讯、运输,拥有调动军车和士兵的权力,是执行秘密转移任务的关键部门。吴石将如此重大的使命交付傅为翘,足见二人之间已超越一般上下级关系,是真正可以托付生死的莫逆之交。

1949年6月上旬的一个深夜,转移行动进入最紧张阶段。吴石将军向傅为翘下达指令:务必派遣可靠的军车与士兵,配合其亲信副官聂曦等人,将核心的298箱“末次情报资料”从于山臧公祠秘密抢运至仓前山福建省研究院书库。

这是一次“提着脑袋”的任务。一旦走漏风声,参与者的身家性命将顷刻不保。然而傅为翘没有辜负挚友的生死相托。这位从加尚村走出的傅氏子弟,将“涉世治事”的家风发挥到极致——他精心挑选了最可靠的车辆与人员,反复勘察转移路线,将行动伪装成研究院运输图书,巧妙避开沿途军警的盘查。当满载民族记忆的卡车在夜色中安全抵达仓前山时,吴石保护国宝的决心,经由傅为翘的忠诚与干练,化为了坚不可摧的现实。

这批298箱“末次情报资料”在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被妥善隐藏,福州解放后完整移交给了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,后运往厦门大学,成为研究我国近代国情的珍贵史料档案。这一行动,不仅为后人留存了研究历史的无价之宝,更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,铭刻下了一位邵武子弟与挚友吴石将军并肩作战、共护国宝的壮丽篇章。傅为翘,这位从加尚村走出的将星,以行动诠释了何谓不负所托、何谓家国大义。



傅为翘夫妇合影

从加尚村走出的傅为翘,以一篇谱序联结挚友深情,以一场护宝写就家国情缘。他的故事,是邵武这方水土深厚人文底蕴的缩影,是吴石将军与邵武子弟生死相交的历史见证。当我们为《沉默的荣耀》中的英雄而感动时,更应记住:在邵武拿口镇加尚村,有这样一位真实的传奇人物,他以赤诚与担当,在历史深处刻下了属于邵武的精神印记。这份沉默的荣耀,历久弥新,熠熠生辉。

红色文化

延平: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回望与时代沉思

□李远圆

闽北群山之间,建溪、沙溪、富屯溪在此奔涌交汇。三江合流之处,便是南平延平。九峰山、戴云山、武夷山三大山脉纵横交错,将这片土地“折叠”成无数深谷幽壑。当地人常说:“铜延平,铁邵武”——这里山高水险,易守难攻,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1934年深秋,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漫漫长征路。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将士,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。他们没有后方,没有补给,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冬衣。但他们用鲜血和信念,在闽北的崇山峻岭间,撑起了南方革命的一面旗帜。

风暴来临之前

时间回到1933年。那年夏天,东方军在彭德怀、滕代远率领下进入延平。8月25日,王台镇被红军解放。消息像山风一样迅速传遍各村各庄——穷人的队伍来了。

“围城打援”,一场接一场的战斗在这片土地上打响。三十多场激战之后,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消耗。更重要的是,红军在这里扎下了根。农会成立了,游击队组建了,土地开始分配给世代代受苦的农民。

到1934年10月,延平苏区已经有了二十多支游击队,两千多人参加了革命组织,七百九十名青年穿上红军军装。这些数字背后,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——他们可能是山坳里种田的汉子,可能是河边洗衣的媳妇,也可能是还没长高的少年。

同一年七月,一支特殊的队伍疾驰而来。红七军团

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,军团长寻淮洲,参谋长粟裕。他们在红九军团护送下穿越闽西。7月29日,先遣队攻克樟湖镇,两个连的敌军被歼灭,一百多人成了俘虏。

红九军团随后进占樟湖镇,控制了沿江要地。军纪严明的红军战士露宿街头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镇上的老人后来回忆:“那些后生仔,睡在屋檐下,天亮了还把地扫得干干净净。”

如今的王台镇,八角楼依然矗立,楼内保留着当年东方军留下的标语数条。这座建于1892年的建筑,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见证了百年历史沧桑。谁也没想到,风暴即将来临。

最黑暗的日子

1934年10月,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传到延平时,许多人不敢相信。苏区的县城一个接一个沦陷,乡村被国民党军反复“清剿”。闽北红军独立师和地方武装陷入了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。断粮是常态,断药也是常态。伤员没有麻药,咬着木棍让战友用刺刀割下子弹。

但活着的人还要战斗。从公开的阵地战转向灵活的游击战,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意味着放弃根据地,意味着钻进深山老林,意味着从正面交锋变成了打游击。

南山镇,地处闽江北岸,是连接闽东游击根据地的咽喉要道。延平北部的红军频繁出入南山、洋后、赤门、王台、峡阳这些乡村。白天藏在山洞里、密林中,晚上摸上山来,发动群众,打击小股敌人。有一支百余人的队伍,由闽北红军58团和迪口游击队组成,在南山镇一带活动了一个冬天。他们没有棉花,就用稻草裹脚;没有粮食,就挖野菜、剥树皮。一位老游击队员后来回忆:“那时候看见一个红薯,眼睛都发绿光,但再饿,也不能拿老百姓的。群众比我们还苦。”

如今南山镇江布村下楼洞自然村的山洞里,至今保留着当年游击队藏身的“红军洞”。洞口高约10米,洞深和洞口宽度各约4米。黄立贵领导的闽北红军曾在此驻扎过。

绝地反击

1935年8月,闽北分区委的会议秘密召开。会议作出决定:兵分三路,打出外线,开辟新区。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抉择。

九月,闽北红军独立师第二团、第三团进入建瓯玉山乡。当地有一支颇具规模的大刀会,原本是中立的民间武装。红军派人与之谈判,晓以民族大义,最终争取到结盟。中共迪口县委在新区成立,闽东北游击根据地由此连成一片。

延平区的游击队越发活跃起来。193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,“迪口独立营”八十余人悄然摸到大坝区公所附近。月黑风高,哨兵还没来得及叫出声,就被捂住了嘴。战斗只持续了十几分钟,区公所的全部武器被缴获。

同年八月间,李子平率百余人收缴民团枪支后转战大坝。敌区长被俘后处决,消息传开,周边反动武装胆战心惊。

1936年3月20日,黄立贵部进攻大坝。区长郑炯被击毙,敌人再也不敢轻易进山“清剿”。

那年秋天,饶守坤、王助率部进入大凤地区。他们做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事——建立联络站。一个秘密的交通点,往往就是一位普通农户的家。老人站岗放哨,妇女传递情报,儿童团在山头用树枝比划暗号。这些平凡的人,构成了游击战争最坚实的神经末梢。

星星之火

在延平境内,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中共闽赣省委机关及武装曾在此活动。闽北、闽东北红军游击队先后坚持了八年的游击战争——比著名的“三年”更长。他们开辟了以凤山地区为中心的“南平凤山游击区”,与周边的屏南、瓯宁、古田、延平连为一体,形成了“屏、瓯、古、延边界游击根据地”。

这片根据地,像一颗钉子,牢牢钉在闽东北的大地上。闽北与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、第六团。1938年2月,五团、六团共2600多名指战员奔赴皖南抗日前线。

五团、六团的指战员中,有衣衫单薄的少年,有满脸风霜的老兵,有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,也有目不识丁的农民。他们的共同点是,都曾在最黑暗的三年里,在山林中像野兽一样生活过,却始终没有丢掉心中的火焰。

回望与沉思

八十多年后的今天,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,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英雄故事。第一,信念的力量。没有补给,没有援军,没有明确的时间表——在那种极端困苦中坚持下来,靠的是什么?不是战术,不是武器,甚至不是生存技能,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信念: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,胜利终将属于人民。



中共闽赣省委机关下楼洞旧址(资料图片)

第二,人民的分量。延平的三年游击战争,每一个胜利背后都站着千千万万的普通群众。他们也许不懂什么革命理论,但他们知道谁对自己好。今天的党员干部,能不能像当年的红军那样,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?还能不能在群众屋檐下坐得住、聊得来?

第三,灵活的生命力。游击战争教会我们一件事:没有一成不变的打法,没有永远不变的策略。从阵地战到游击战,从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,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阵痛,但每一次转型都让这支队伍变得更强大。

永不熄灭的灯火

三江水依旧奔流,九峰山依旧青翠。延平这片土地上,当年的战壕已经被草木覆盖,当年的弹孔已经被岁月磨平。但那些在山林中奔跑的身影,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神,那些在绝境中依然嘹亮的歌声,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基因。

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,它是无数人用生命写下的真实。今天,当我们走在延平的街道上,看着车水马龙、万家灯火,应该想起——八十多年前,有一群人,在同样的星空下,穿着草鞋,嚼着野菜,握着锈迹斑斑的步枪,为这片土地的明天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他们的名字,许多已经无人知晓。但他们的精神,像三江汇流一样,奔涌不息,汇入大海。这就是延平留给时代最珍贵的遗产。



王台东方军谈判旧址(八角楼)(资料图片)